

提高人才使用效能与 数字出版人才培养

●李云龙

摘要：数字出版人才是推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强调传统出版专业人才和新兴数字技术人才的合作，以企业为主体，在共同实施数字出版重大项目过程中打造数字出版人才，并由此带动学校教育、继续教育数字出版专业的发展，既是产业发展的要求，也是顺应数字出版教育规律的主动选择。本文基于提高人才使用效能的考虑，探讨了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具体操作策略。

关键词：数字出版 人才使用效能 人才培养

数字出版人才知识、能力教育建构的失衡，数字出版人才教育课程实施的顾此失彼，数字出版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困境，对如何调适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策略和如何满足数字出版企业对于人才的迫切需求提出了新的命题。

一、基于提高人才使用效能考虑的 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策略

数字出版是科技发展所引发的学科融合的产物，在数字出版教育未能造就适合的“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之前，通过分科专门人才——数字技术人才与其他特定专业人才的分工合作来突破数字出版这一新兴复合业务面临的产业发展困境，应该是基于产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现状的、提高人才使用效能的优选方案。一方面，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旧有的特定专业的人力资源和内容资源，借助自身对于特定领域专业出版知识的了解，准确定位、开发、遴选相关内容，培育终端读者阅读取向，开发潜在阅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利用现有信息技术而不限于数字技术方面的专业人才，充分发挥他们在信息的采集、整理、集成、表达方面的优势，克服其特定专业知识方面的短板，着力解决其他特定专业知识如何在数字条件下满足终端读者的阅读需求。与由尚未成熟的“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主导数字出版业务相比，两类不同教育背景和专业背景人员的合作，更易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从

而以专业高点攻克行业难点，这是什么都懂、什么都不精的一般“复合型”人才难以胜任的。

结合近年数字出版方面典型案例的梳理，也许可以获得基于提高人才使用效能考虑的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策略的更多启示：

第一，数字出版人才必须具备整合专业资源的能力。数字出版以特定专业领域编辑为主体，盘点本企业、本专业领域已有传统出版内容资源。数字出版在“量”上的特征，是海量信息的提供与传播，没有一定规模的信息量，数字出版则无从谈起。稍有历史的出版企业，都会积累一定数量的传统出版内容资源，为适应数字出版在量上的要求，必须对其重新收集、整理，形成按照知识类别划分的专题类。在盘点传统出版内容资源过程中，数字技术人才需要提出建议：本企业已有出版物除版权之外的信息标注还可以有哪些，某类专题已有其他出版企业的出版物是什么，是否还有同类未知出版物以便预留数据库扩容接口，能否提供基于出版视角的评注信息以支持后续同类选题开发。在基础教育教材出版领域，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民国老教材《开明国语课本》，在业界掀起了不小的热潮。民众对于老教材追捧的是非这里不便讨论，以对基础教育教材收集的完备、研究的深入而论，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然最为权威，从出版、研究的系统性来看，人教社在百年教科书的数字出版领域应该更有作为。

第二,数字出版人才必须具备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的能力。数字出版人才应立足于特定专业领域,着眼于终端读者的个性化、人性化需求,致力于数字出版“定制”服务。Wordpress 公司 CEO 马特·莫楞威格说:“目前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探索新鲜事物,搜索引擎已经使我们能够迅速了解所有新鲜事物,也不是信息发布,这一点 Wordpress 这样的内容管理系统也已经解决了。信息的过滤才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1]从接受者来看,企业能够提供过滤之后的信息属于定制式的按需服务,这种服务形式导源于 IT 界最新提到的云计算。云计算有五个方面的特性,即基于网络的计算、以服务形式提供功能、资源共享、服务的快速伸缩性、按需服务和收费。^[2]云计算与数字出版的全面融合,目前国内出版企业还难以做到,但参照云计算的个别理念促进数字出版的开展,却可作为二者走向全面融合的起始之步。

在数字出版概念出现之前,定制式按需服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传统出版之中了。对书稿是否达到出版要求的内容认定、多个环节的编审校工作,从读者视角来看,都属于满足去除芜杂、错误、无效信息的信息过滤服务范畴。今日数字出版强调的定制式按需服务,已经不限于传统图书编校层面的信息过滤,它需要专门领域的编辑人员,在深入调查本领域传统出版内容分布的基础上,广泛研究不同类别、层次的读者对于本领域内容的细化需求,然后协同数字技术人才,设计计算参数和运行程序,借助这些参数和程序,过滤出目标内容,以满足特定读者的特殊需要。在这种工作模式中,特定知识领域编辑人员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对相应学科知识和已有出版物具备全面深入的了解,同时能够据此探究读者潜在需求,他们能够在产品内容供应方面,更好地贴近读者。数字技术人才的专业素养于此同样至关重要,它关系到数字服务的最终实现。从谷歌、亚马逊、IBM、微软等国际知名公司的实践来看,数字出版所需技术已经不是问题。

中国学界熟知的中国知网,因相对全面的检索、增值信息的提供、自主图书馆创建等方面的功能,已经实现了一定层次的“定制”服务。然而,中国知网所侧重的只是期刊领域,期刊领域因与生俱来的专业

血统和相对严密的参数标记,无形中降低了工作强度和难度,其数字化本身就有良好保障。在图书领域,虽也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电纸书,但是因为内容领域的先天不足,这些电纸书具有规模不足、难成系统的通弊,即便具备数字技术优势,也很难在满足读者定制服务上有更大作为。以笔者熟知的教育图书出版而言,它的“定制”服务既是庞大的读者需求使然,同时又极具操作空间。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教育发展程度不一,如何实现着眼于地域要求的特色教育,是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基本要求。从教育出版的图书类别和内容结构来看,它们几乎已经覆盖各级各类、多种介质形式的教育理论、教学实践、教学资源领域,即便是一本普通教材,一般也由教授系统、学习系统、资源系统构成,这些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完成了初始计算参数的设置。如果能够结合学校与学生的个体需求,适当补充相应内容门类,并做些升级开发,教育出版首先实现真正意义的数字出版应非难事。

第三,数字出版人才必须具备执行数字化标准与开发运营数字化平台的能力。在有效利用已有图书内容资源进行定制式数字出版的基础之上,数字出版人才应该开展以数字出版为直接指向的编辑工作标准的研讨、建立和数字出版编辑平台的开发工作。已有图书内容的数字转化终有尽时,新版图书亦在不断推出,为使新书在启动之初即同时满足数字出版要求,提高传统编辑的编校质量,同时促使传统编辑向数字出版编辑转型,习得数字出版流程,落实数字出版任务,已经参与定制式数字出版的两类人员,需要继续研究适应本企业要求的数字出版工作标准、工作流程和开发数字出版编辑平台。制定标准、流程和开发数字出版编辑平台的过程,实质是两类人员以往定制式数字出版工作经验的总结、提升和外化,它要求从出版起点引入数字工作,按照模式化流程规范、优化工作程序,在出版终点一次性完成数字出版任务。

上海辞书出版社在编纂《辞海》等大型工具书时,使用了自主开发的辞书质量技术保障系统,使编辑、加工经验数字化,并形成交叉、交互数据库,保障图书编纂质量。在这套系统中,包括各种子数据库,譬如干支与公元纪年转换、量和单位使用系统、

历史人名典籍系统、外国国名人系统、机构组织系统、交互编辑系统、加工历史存储与提取系统、统一用语和词目索引生成系统等,它的使用大大减轻了大型辞书编纂过程中固定、专有、客观内容的复核工作,国名、地名、人名等固定信息和参见、交叉等结构性处理几乎毫无疏漏。^[3]它表明数字技术已不只是面向读者阅读、检索等个性需求的功能支撑,它同时亦是编辑、加工的技术保障。辞书质量技术保障系统的开发与使用,实际是以数字技术反哺传统编校工作。

数字出版改变的当然不限于出版形式和传播形式,从产品研发的视角来看,它必须要求以数字出版为直接指向的、不同于传统出版的编辑平台的设立。这一编辑平台,不只是将图书电子文档转换成相应的数字化文件,它要达到数据交换平台的一致性、数据的规整性、非纯文本数据的可视性、数据的可检索性以及数据的可迁移性、整合性等方面的要求,同时具备音视频等其他资料和相关拓展功能导入接口。在数字编辑平台搭建过程中,传统编辑人员可据以往经验提出数字技术支撑要求,与数字技术人员针对消费终端的定制服务需要,共同探究结合编辑流程、植入编辑平台的服务解决手段和办法。

二、实现应时所需的数字出版 核心领域的人才培养

与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有关的,并不限于培养策略一端,它与企业日常管理、经营紧密联系,同时又对高校教育不乏直接影响。

新世纪以来,为应对数字技术给传统出版业带来的挑战,出版企业相继设立数字出版专门部门或公司,这些部门或公司常常由具有IT背景的门户网站或其他相关实体演变而来,其从业人员也多是原企业的自然转入。上述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策略表明,数字出版从业人员并非具有数字和出版教育背景的简单相加,单纯的IT从业背景当然无法满足数字出版要求。数字出版是科技进步所引发的专业融合的产物,与数字和出版相比,数字出版具有更新、更强的专业性。欲在这一专业领域有所作为,必须有效利用这一领域的知识资源。出版生产属于知识生产,数字出版关注的是数字技术背景之下的知识生产。因此,新建

数字出版部门或公司,不独有数字技术人才,还要配备至少同等数量、具有较高水平的特定专业人员。此类专业人员不能仅是顾问人选,他们须能以自身专业素养、数字出版身份与数字技术人才协同开展工作。人们往往以涉嫌垄断、侵犯版权解读谷歌在线图书馆计划遇阻,^[4]这项曼哈顿法院裁定引发的又一思考应该是:缺少专属版权的技术,即便已经世界领先,也不会拥有领先世界的用武之地。因此,无论是从传统内容生产角度,还是从基于数字消费的内容生产角度,与版权对应的专业知识编校人员,在数字出版企业中都必须得到足够重视。

上述三个方面的人才培养策略,已经触及数字出版核心领域。其他专业领域人才难以简单移植,高校数字出版专业毕业学生不易入手,因此必须依托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平台的建立,在共同实施数字出版重大项目的过程中,实现应时所需的数字出版核心领域的人才培养,并由此带动学校教育、继续教育数字出版专业的发展。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人才使用效能明显提高”作为人才发展的一项战略目标,并指出,“加强实践培养,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工程、重点学科和重点科研基地、国际学术交流合作项目,建设一批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基地”。结合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来看,通过企业专业编辑人才和数字技术人才积极合作来提高出版企业的人才使用效能,既是迎接数字技术挑战、加强企业数字出版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必须之举,同时也是促进数字出版专业教育应时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 [1] Sean. 他们如何影响世界?——80后数字商业领袖[J]. 四川航空, 2011(90).
- [2] 虞慧群, 范贵生. 云计算发展分析与展望[J]. 软件产业与工程, 2011(5).
- [3] 乐嘉民. 辞书质量技术保障系统的研发与应用[J]. 中国编辑, 2007(1).
- [4] 刘晓春. 谷歌数字图书馆[J]. 电子知识产权, 2011(Z1).

(作者单位: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